

冰心手稿藏身日本九州大学：《春水》手稿、周作人、滨一卫及其他

中里见，敬
九州大学语言文化研究院

<https://hdl.handle.net/2324/1810704>

出版情報：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studies. 2017 (6), pp.163-178, 2017-06-15.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编辑部
バージョン：
権利関係：



文献史料研究

冰心手稿藏身日本九州大学

——《春水》手稿、周作人、滨一卫及其他
〔日〕中里见敬

引言

九州大学（日本・福岡）图书馆的“滨文库”收藏了原九州大学教授滨一卫所有的图书和其他重要文献资料，其主体部分是多达939种的中国戏剧资料（以1930年代北平为主），共约2500册。^①其中包含近200张的戏单、1000册唱本以及当时的有关报纸杂志等等。“滨文库”这批资料文献的丰富多样及其稀缺不可替代性，使得它享有1930年代“中国戏剧资料宝库”的盛誉，受到国内外专家的重视。中国学者黄仕忠教授曾对滨文库做过细致调查，其考察研究成果可见《日藏中国戏曲文献综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日本所藏中国戏曲文献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②作为九州大学的教师，笔者近十年来一直在对该文库进行整理和研究。根据滨一卫的遗稿，整理出版了《中国の戯劇・京劇選：濱一衛著訳集》（福岡：花书院，2011年）；对滨文库所藏唱本进行详细调查，编制了《濱文庫所蔵唱本目録》（福岡：花书院，2015年）。

滨一卫（1909—1984）是一位中国戏剧研究家，曾于1934年6月至1936年6月赴北平留学，与周作人一家有诸多交往。文库中的大量中国戏剧资料是滨一卫一生辛勤寻访搜集的心血结晶，其中在北平留学期间搜集的资料尤其珍贵。笔者在研究滨一卫与周作人的关系时，注意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第11期发表了《周作人日记》中未公开的1939年部分，其中10月5日的日记中，有如下

重要记载：“下午又整理旧报。得《春水》原稿，拟订以赠滨君。”此处的“滨君”指的就是滨一卫。依照这条线索，笔者翻检排查滨文库的文献资料，居然顺利找到这部十分宝贵的手稿。以下本文将具体介绍冰心《春水》手稿的有关情况，并对手稿东渡日本的经过及其周边情况进行考察探究。

一 冰心《春水》手稿概况

九州大学图书馆滨文库所藏冰心《春水》手稿一部，大小尺寸为17.4厘米×13.0厘米。整册手稿依次为：封面1页、周作人题记1页、自序1页、《春水》诗作正文115页。手稿以毛笔小楷竖行单面书写于无格白纸，字迹运笔流畅，秀美雅致；手稿由周作人以线装方式装订成册。手稿附有书帙，但应为1987年设立滨文库时统一制作。手稿保存状态十分良好，仅在个别书页（第67、75、80、95、103、107页）有红笔标注的数字或符号，无其他修改或标注痕迹。自序最后署有“十一，二一，一九二二”（1922年11月21日），应为手稿的书写日期；手稿末尾署“三，五——六，十四，一九二二”（1922年3月5日—6月14日）。《春水》最初于1922年3月21日到6月30日之间陆续连载于北京《晨报副镌》。首页诗集名“春水”左侧，有“新潮社文艺丛书”字样，故基本可以确定手稿是为刊行诗集单行本所抄录的定稿。1923年5月，《春水》作为新潮社文艺丛书之一出版发行。

手稿的主要部分，包括断行情况等，如下所示：

置于手稿最前面的，是周作人亲笔挥毫书写的题记，竖写，五行，五十八字，无标点。（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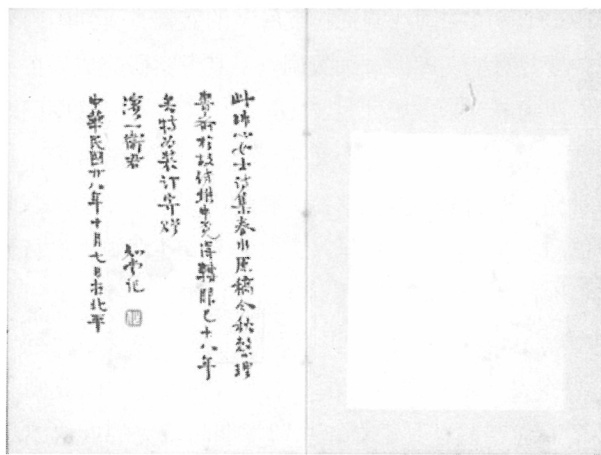


图1 《春水》手稿 周作人题记

此冰心女士诗集《春水》原稿今秋整理书斋

于故纸堆中觅得转眼已十八年矣
特为装订寄赠
滨一卫君 知堂记（印章“作”）
中华民国廿八年十月七日在北平

次页为《春水》诗集手稿首页，即封面。三行。（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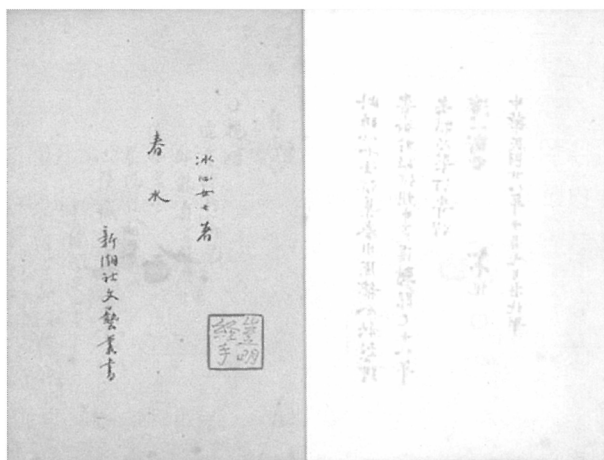


图2 《春水》手稿首页（封面）

冰心女士著
春水
新潮社文艺丛书

此页右下方盖有“岂明经手”的四方红印。

再次为“自序”，现按手稿原样抄录：（图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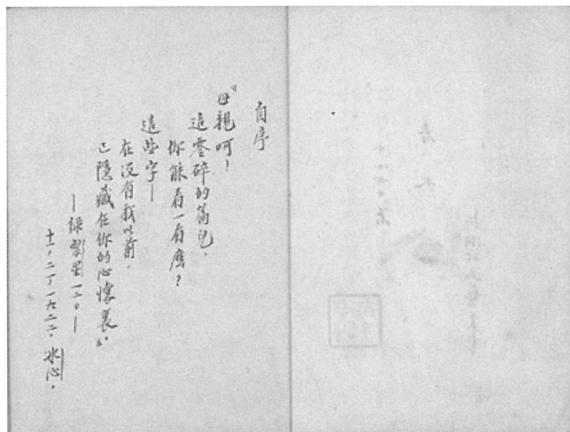


图3 《春水》手稿“自序”

自序
“母亲啊！
这零碎的篇儿，
你能看一看么？
这些字—
在没有我以前，
已隐藏在你的心怀里。”
—录繁星一二〇—
十一，二一，一九二二。冰心。

《春水》正文共115页，每页11行。每页每行开头部分不都取齐，作者有意精心排列诗行，以求获得新鲜的视觉效果。如《春水》正文首页：（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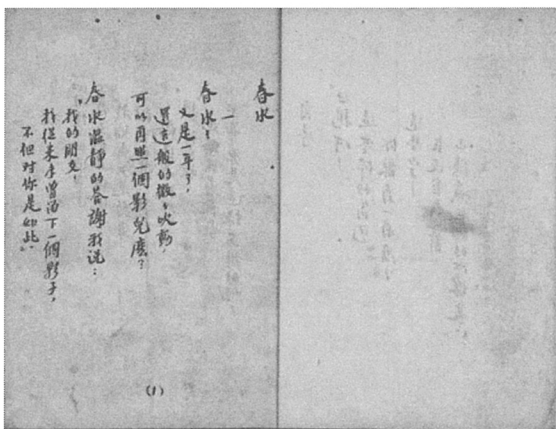


图4 《春水》手稿第1页

春水

一
春水！
又是一年了，
还这般的微微吹动，
可以再照一个影儿么？

春水温静的答谢我说：
“我的朋友！
我从来未曾留下一个影子，
不但对你是如此。”

最后的第182篇如下：（图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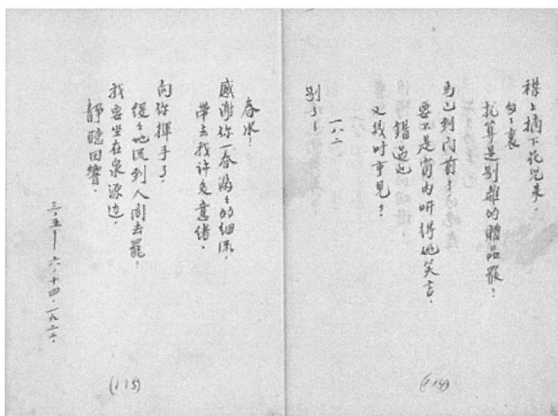


图5 《春水》手稿第114、115页

一八二

别了一

春水！

感谢你一春潺潺的细流，
带去我许多意绪。

向你挥手了，
缓缓地流到人间去罢！
我要坐在泉源边，
静听回响。

三，五——六，十四，一九二二。

经过比照可以发现，手稿诗篇诗行的排列方式，和《晨报副镌》连载时的排列形式并不相同。在《晨报副镌》上，所有诗行均呈顶格状态，行头无空格。

关于《春水》刊载发表过程，冰心本人有过具体记载。她在1932年发表的《我的文学生活》一文中说道：

我开始写作，是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后。——那时我在协和女大，后来并入燕京大学，成为燕大女校。（中略）我找到《晨报副刊》，因为我的表兄刘放园先生，是《晨报》的编辑。那时我才正式用白话试作，（中略）

谈到零碎的思想，要联带着说一说《繁星》和《春水》。（中略）《繁星》和《春水》不是诗。至少是那时的我，不在立意做诗。我对于新诗，还不了解，很怀疑，也不敢尝试。我以为诗的重心，在内容而不在形式。同时无韵而冗长的诗，若是不分行来写，又容易与“诗的散文”相混。

我写《繁星》，正如跋言中所说，因着看泰戈尔的《飞鸟集》，而仿用他的形式，来收集我零碎的思想（所以《繁星》第一天在《晨副》登出的时候，是在“新文艺”栏内。登出的前一夜，放园从电话内问我，“这是什么？”我很不好意思的，说：“这是小杂感一类的东西……”）。^③

冰心认为“诗的重心，在内容而不在形式”，有韵无韵这一形式是次要的，但同时也说“无韵而冗长的诗，若是不分行来写，又容易与‘诗的散文’相混”。由此可见，《春水》手稿诗行的排列形式，体现着冰心对于诗歌的见解，具有强烈的“形式”的意味。《春水》是诗，而不是不分行的“诗的散文”。

周作人曾在《晨报副镌》发表评论连载《自己的园地》，其中《论小诗》一文曰：

所谓小诗，是指现今流行的一行至四行的新诗。这种小诗在形式上似乎有点新奇，其实只是一种很普通的抒情诗，自古以来便已存在的。（中略）我们日常的生活里，充满着没有这样迫切而也一样的真实的感情；他们忽然而起，忽然而灭，不能长久持续，结成一块文艺的精华，然而足以代表我们这刹那刹那^④的内生活的变迁，在或一意义上这倒是我们的真的生活。

如果我们“怀着爱惜这在忙碌的生活之中浮到心头又复随即消失的刹那的感觉之心”，想将他表现出来，那么数行的小诗便是最好的工具了。（中略）

近年新诗发生以后，诗的老树上抽了新芽，很有复荣的希望；思想形式，逐渐改变，又觉得思想与形式之间有重大的相互关系，不能勉强牵就，我们固然不能用了轻快短促的句调写庄重的情思，也不能将简洁含蓄的意思拉成一篇长歌；适当的方法唯有为内容去定外形，在这时候那抒情的小诗应了需要而兴起正是当然的事情了。（中略）

冰心女士的《繁星》，自己说明是泰谷尔影响的，其中如六六及七四这两首云，（中略）可以算是代表的著作，其后辗转模仿的很多，现在都无须列举了。^⑤

周作人关于小诗的见解至为精当，而下面这段话，无疑是对冰心的有力声援和激励：“小诗的第一条件是须表现实感，便是将切迫的感到的对于平凡的事物之特殊的感兴，迸跃的倾吐出来，几乎是迫于生理的冲动，在那时候这事物无论如何平凡，但已由作者分与新的生命，成为活的诗歌了。”^⑥谈到欧洲的小诗，周作人指出罗马小诗中具有讽刺和说理的成分：

欧洲本有一种二行以上的小诗，起于希腊，由罗马传入西欧，大抵为讽刺或说理之用，因为罗马诗人的这两种才能，似乎出于抒情以上，所以他

们定“诗铭”的界说道：
诗铭同蜜蜂，应具三件事，
一刺，二蜜，三是小身体。^⑦

显然，周作人在课堂上讲过的小诗，给予冰心很多教诲，也给她留下深刻印象。从1920年代到1950年代末，时隔三十多年，冰心对当时的情景依然记忆犹新：

我上新文学的课，也听先生讲过希腊的小诗，说是短小精悍，像蜜蜂一样，身体虽小却有很尖利的刺，为讽刺或是讲些道理是一针见血的等等。而我在写《繁星》的时候，并没有想到希腊小诗。^⑧

周作人推崇希腊以来的欧洲小诗传统，认为中国的小诗缺乏讽刺和说理，而显然冰心的小诗至少不以“讽刺和说理”见长，没有那“很尖利的刺”。但她那“春水”般的自然清新和优美温暖，充满魅力。于是，《春水》成为周作人主编的新潮社文艺丛书的第一册，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出版。在这个意义上，《春水》先在报纸刊载，继而出版诗集，一时“洛阳纸贵”，最终成为新文学的经典，而周作人的鼓励提携可谓功不可没。

周作人除了大力支持《春水》诗集出版以外，还极力向日本读者推荐冰心的作品。对此日本学者饭田吉郎和萩野修二有详细研究^⑨，可资参考。周作人翻译过冰心的两篇作品，刊登在日文期刊上。署名“仲密译”的《爱的实现》刊载于《北京周报》第18号（1922年5月28日发行），这是周作人第一次将冰心作品译成日文发表。第二篇是《晚祷》，刊登在《北京周报》第48号（1923年1月14日）。《北京周报》系1922年1月在北京创刊的日文期刊，是日本人藤原镰兄负责编辑发行的报纸《极东新信》的周日版。在《爱的实现》之前，《北京周报》第7至9号（1922年3月5、12、19日）连载了冰心《繁星》的中文原文版^⑩，与1922年1月《繁星》在《晨报副镌》上连载仅隔两个月。萩野修二认为：“丸山昏迷委托周作人撰文介绍以北京为中心的中国新文艺。周作人承诺后，将风靡一时的冰心诗集《繁星》推荐给他。因周作人诸事繁忙，无暇翻译，所以刊登了《繁星》中文原文1到81篇，随后把小品《爱的实现》译成日文交给了丸山。”^⑪

周作人《关于〈爱的实现〉的翻译》（1922年8月28日《晨报副镌》）一文有如下描述：

今年春天得到在上海的友人的信，里边说起日本的一种什么报上有一

篇文章，对于中国的新兴文学大加嘲骂，还把《爱的实现》看作自由恋爱的礼赞，特别加以讥笑。我想中国的新文学诚然还很幼稚，不能同别国的去抗衡，但是这位记者误会了《爱的实现》，却是他自己不懂中国语的缘故。我又常见日本杂志上所译载的白话诗里也多错解的地方，心里便想倘若由中国人自译，即使文章拙劣，意思总不会错了。但我自己知道不是胜任的人，所以并无着手去做之意，只是抱着这样一个空想罢了。到了夏天，有日本的知人在北京刊行杂志，嘱我做点文章，我因为自己发不出什么议论，便改变方向，想来尝试译点小说。这个动机本是由于《爱的实现》的批评，因此便想翻译这一篇，但因别的关系，先译了《隔膜》里的叶绍钧君的《一生》，以后第二篇才是冰心女士的《爱的实现》，第三篇是《新青年》里的鲁迅君的《孔乙己》，第四篇是《创造》季刊里的成仿吾的《一个流浪人的新年》。（中略）我的选择，差不多是无所依据的，只以自己的趣味为标准，或者觉得他可以代表著者的思想和艺术，也就收入。^⑫

周作人在《北京周报》（1923年1月14日）刊登的日文翻译《晚祷》之前有如下一段话，表达了他对这位优秀诗人的欣赏和赞美：

原文：冰心女史は極く少い現代支那の詩人の中では詩思の豊かな人として自他の許してゐる人であるが、殊特に此晚禱は多くの詩の中で勝れたものである、女史は近く小説集及び詩集「繁星」（一部曾つて本誌に出した）春水等を出版すると云ふ。

中文翻译：冰心女士是极少数的现代中国诗人中，无论是自己还是别人都承认的富有灵感的诗人，在她的诸多诗篇中，《晚祷》尤为出色。她小说集及诗集《繁星》（部分已在本刊登载）、《春水》即将出版。^⑬

二 《春水》手稿如何流传到日本

《春水》于1923年5月出版后，诗集手稿便留在丛书主编周作人家里。这一时期，周作人不仅是冰心在燕京大学的任课老师，还是她的毕业论文的指导教师。冰心晚年在《我的大学生涯》（1985年）一文中留下了宝贵的回忆：

这时已是一九二三年的春季，我该忙我的毕业论文了。文科里的中国文学老师是周作人先生。他给我们讲现代文学，有时还讲到我的小诗和散文，我也只低头听着，课外他也从来没有同我谈过话。这时因为必需写毕业论文，我想自己对元代戏曲很不熟悉，正好趁着写论文机会，读些戏曲和参考书。我把论文题目《元代的戏曲》和文章大纲，拿去给周先生审阅。他一字没改就退回给我，说“你就写吧”。于是在同班们几乎都已交出论文之

后，我才匆匆忙忙地把毕业论文交了上去。^⑭

周作人的《春水》手稿题记写于1939年10月7日，记曰整理书斋时“于故纸堆中觅得”《春水》原稿。查《周作人日记》，在“1939年10月5日”项下有如下明确记载，与题记完全一致：

十月五日 晴 下午又整理旧报。得《春水》原稿，拟订以赠滨君。卖故纸千四百三十斤，得七十一元，留廿元备裱糊外院西屋之用，以其余分给家中用人。^⑮

周作人5日觅得原稿，当天日记便想好用处，“拟订以赠滨君”，装订好作为礼物赠送给滨一卫。到7日便写好“题记”，8日即投递邮寄出去。所幸，这一整个过程在《周作人日记》中均有记载：

十月八日 阴，冷
发信：滨（件）、《华光》（稿）

十一月十日 晴，冷，见冰
收信：滨一卫

十一月二十四日 晴，风
下午遣人取滨君寄小包来，乃是照片也。

十一月二十九日 晴，风
发信：沪抱经堂（航信）、滨一卫、耀辰

11月10日，周作人收到滨一卫回信，当天的日记虽未提及信的具体内容，但不难推测必定是滨一卫收到《春水》手稿，表示感谢等等。11月24日，周作人还收到滨一卫寄来照片的包裹。滨一卫喜爱摄影，邮寄的照片很可能是同年8月滨一卫访问周家时拍摄的。11月29日，周作人致信滨一卫，感谢寄来照片。总之，《周作人日记》记载了滨一卫来信，但没有记录来信的具体内容，而滨一卫方面也没有留下有关《春水》手稿的记载。事到如今，几乎所有的线索和答案都来自周作人的日记，这不禁令人庆幸。

1952年，滨一卫在九州大学开设“中国文学略说”这门课程，讲解闻一多等现代诗人的诗歌。滨文库保存有这门课的笔记本，其中夹着一页滨一卫亲自编

写的讲义（滨文库／日文戏曲／21）。讲义上油印了郭沫若《笔立山头展望》，谢冰心《春水》33、64、88、182，闻一多《洗衣歌》《死水》，李后主《虞美人》，何鹰《送花的姑娘》等作品。讲解作品一览中意外插入五代十国时期南唐后主李煜的《虞美人》，想必是滨一卫由冰心的《春水》想到了李后主那句“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①6}的千古名句。这页讲义是目前发现的滨一卫提及冰心的唯一材料。另外，笔者在滨文库里还找到冰心的《寄小读者》（北新书局，1941年6月第36版），书中随处可见滨一卫标注的注音字母。可以推测滨一卫是一字一句读过这本书的。

三 周作人、周丰一父子与滨一卫

滨一卫，祖籍日本冈山县，1909年出生于大阪，1930年毕业于（旧制）浪速高等学校（相当于现在的高中和大学本科一、二年级。现为大阪大学丰中校区），1933年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中国文学专业。在滨一卫刚考入大学不久后的1930年10月，周作人的儿子周丰一（1912—1997）来到大阪，准备参加高等学校（高中）入学考试，并于1931年4月考入浪速高等学校。1930年秋，经浪速高等学校汉文教授佐藤文四郎介绍，京都帝国大学一年级学生滨一卫与周丰一相识，开始密切交往。一年后的1931年9月，“九一八事变”爆发，为抗议日本的行径，周丰一与另外两个中国留学生中途退学归国。^{①7}

1934年6月至1936年6月，滨一卫作为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留学生赴北平留学。在滨一卫留学的两年中，《周作人日记》中有三处（天）记载提到滨一卫：

1934年9月5日 上午，滨一卫君同舟冈、并河二君来访。

1934年12月1日 下午，滨君来寄宿丰一之西屋。

1935年2月23日 丰一招小川、桂、目加田、滨及沈令翔诸君饭。客多大醉，小川留宿。^{①8}

1934年7月11日，周作人与妻子羽太信子赴日本探亲，受到日本文坛人士的欢迎，9月2日返抵北平^{①9}，三天后的9月5日，滨一卫前来周府拜访。滨一卫于1934年6月15日抵达北平，先是住北平东城西堂子胡同中华公寓，在东单三条胡同一家由日本人经营的学校——“同学会”学习汉语。10月，滨一卫搬到东城栖凤楼37号，住进名叫高吉的人家。后来得周丰一相邀，于12月1日搬进八道湾周作人家，从此得到周家的关心照料。

据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档案资料记载^{②0}，1934年9月，周作人曾为日本留学生旁听北京大学课程提供帮助。当时，同在北平留学的日本留学生目加田诚

(1904—1994)、小川环树(1910—1993)等希望到北大旁听,但因中日关系紧张北京大学明令禁止日本人听课。后来在周作人的斡旋下,文学院院长胡适特批许可旁听。目加田诚,1929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1933年任九州大学副教授,1934年由日本文部省派遣到北平留学,1942年升为九州大学教授,1967年从九州大学退休后,就任早稻田大学教授,曾担任日本中国学会会长等要职。小川环树,1932年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1938年到日本东北大学赴任,1950年任京都大学教授。目加田和小川二人在北平留学时与滨一卫交往频繁。后来目加田和小川均成为日本中国文学研究的权威学者。而滨一卫则开启了中国戏剧表演史这一崭新的研究领域。(图6)



图6 北海滑冰合影。由左至右依次为周丰一、目加田诚、滨一卫、小川环树

有关日本留学生旁听北大课程的经过,小川环树曾有这样的回忆:

北大的课程迟迟不许旁听,最后拜托周作人介绍斡旋,好不容易听上了。那时,不巧发生了柳条湖事件,两国关系不好。校方声称旁听也需要考试。当时要是参加考试就好了。后来我看到过北京大学的入学考试题,很容易,要是考的话,没问题可以考上的。但我们以为会很难,便害怕退缩了(中略)。当时的文学院院长是胡适,要想听课首先要拜访他,向他表示敬意,于是我们几个人便一起去拜访了胡适先生。^{②1}

这几位日本学生从9月28日开始旁听北大的课。有关具体情况,目加田诚《北平日记》中有如下记载:

9月28日 与小川、滨、桂诸君同往北大。周丰一君特来住处迎接。办理旁听手续。听黄节、马廉课。

9月30日 返住所后,与小川君访周作人。

10月29日夜 为答谢帮助北大旁听一事，宴请周君，与小川、滨君等在俄罗斯公寓聚餐。^{②②}

《周作人日记》中也有下面一条记载：“9月30日 目加田、小川二君来访。”^{②③}

目加田诚结束留学即将回国的时候，周丰一特意邀请几个朋友来开送别会。上面引用的《周作人日记》1935年2月23日记载的就是这次送别会。目加田诚《北平日记》的同日日记也有：“夜，周作人府送别会，大醉，被架回家。”^{②④}

对此，周丰一在回忆中有下面一番话：“此处既说‘大醉’又说‘客多’，现在想来似乎不大可靠。皆因‘大醉’即醉得厉害，瘫倒难以站立行走，而小川和目加田两先生并非如此。我记得两人不过是脚步有些跌跌撞撞而已。”^{②⑤}

1934年6月至1936年6月，即滨一卫留学北平之间，《周作人日记》中有三条有关滨一卫的记载。当然，两年三次或许证明不了二人之间有特别紧密的关系，但两人身份明显不同，一个是在中国学术界和文坛声名卓著的作家教授，一个不过是年仅二十多岁的日本留学生。因此，在日记中出现的次数不多，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不过，仅仅时隔3年，到了1939年的《周作人日记》中，竟然一下子有16处出现滨一卫的名字，其中9处为书信往来记录。由此可知，滨一卫结束留学回到日本后，一直与周作人保持联系，并逐渐得到周作人的信赖，关系更加紧密。1939年8月，滨一卫第二次来到北京，前往周府拜见周作人，得到关照并住在周府。此间前后经过，可见《周作人日记》的一系列记载：

八月二日 夜滨一卫君自日本来，留住。

八月八日 滨君得电报云十四日征集。

八月九日 晚滨君索旧照片及友人书，以平伯诗二、玄同札一赠之，又予以所书《掷钵诗》一纸。

八月十日 上午六时滨君出发归国。

八月十一日 得青岛滨君之兄电，晚发回电，二十五字二元一角五分也。^{②⑥}

关于此次滨一卫重访北平，周丰一曾有更加具体的回忆：

滨兄第三次来京是在战争年代，在战争开始走向收尾的时候，他突如其来的现身八道湾。我们全家喜出望外，热情招待。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几天后，一纸无情的征兵令居然追到北京。原本想在北京快快乐乐呆上一阵，但现在却迫不得已，只得立即回国。

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后来，滨兄突然有信来，说他被派到了台湾，现在正在老家省亲，不必担心。现在想来，滨兄这样的眼睛近视，体质也绝对不适合当兵的学者，竟也被逼穿上军装，实在是可笑。^{②7}

滨文库里还保存着当年从日本大阪发到北平八道湾周作人府上的两封电报。第一封为：“临时召集令至，8月14日入伍。速归。”（图7）第二封曰：“滨一卫在否，请速回电。”就这样，一纸征兵令，从日本追到北平，滨一卫匆匆回国，从此再也没有机会来到北京，也没能与周作人、周丰一重逢。

综上所述，早在1930年，年龄相差无几的滨一卫与周丰一在大阪相识，成为亲密的好朋友。三年后，滨一卫来北京留学两年，更与周丰一、周作人父子有过诸多过往交谊，结下终生友情。因为这样的缘由，1939年10月5日发现《春水》原稿时，周作人径直想到滨一卫。可见，赠送《春水》手稿并非偶然之事，它已然是这对忘年交——一个中国文人与一位喜爱并研究中国文学的日本青年——的一种友情交流方式。^{②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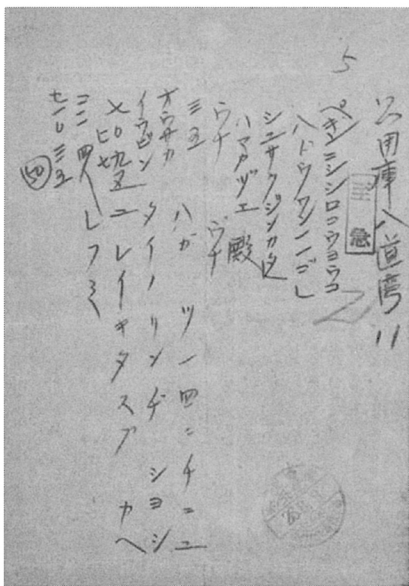


图7 1939年8月8日电报

四 “滨文库”

滨一卫长期任教于九州大学（1949—1973年），从事中国戏剧研究。主要著作有《北平的中国戲》（东京：秋丰园，1936年），《支那芝居の話》（东京：弘文堂书房，1944年），《日本芸能の源流：散楽考（日本文艺之源流）》（东京：角川书店，1968年）；主要译作有《琵琶記》（《中国古典文学全集》第33卷，东京：平凡社，1959年），《拜月亭》（《中国古典文学大系》第52卷，东京：平凡社，1970年）；此外，还有约40篇论文。^{②9}

1984年滨一卫因病逝世后，东京大学的田仲一成教授和九州大学的合山究教授强烈呼吁保存滨一卫所收集的中国戏剧资料，并为此做了大量工作。经过他们的不懈努力，九州大学图书馆于1987年设立了滨文库。按《濱文庫（中国戲

劇關係資料)目錄》第二版所載,文庫共計收藏有古籍 226種,新學 508種,期刊 45種,日文书 78種,補遺 82種;此外,《濱文庫2008年追加目錄》(內部資料,九州大學附屬圖書館,2008年)追加收錄了52種其他零散資料。這些資料文獻中包含了不少具有重要歷史學術價值的原始資料:

戲單183張(1930年代,以北平為主)

唱片131張(解放前後)

剪報:1934年至1980年間有關戲劇的中國報紙(包括部分日本報紙)剪報
戲劇期刊45種(1930—1940年代)

唱本1125冊(光緒至民國時期)

民國時期戲劇類書籍

濱文庫藏品的最大特色在於,它擁有1930年代以北平為中心的大量中國戲劇第一手資料,這些資料均由濱一衛本人在留學北平期間親自收集,以其稀缺且不可再生不可代替,愈發顯示出其文化學術和社會歷史價值。另外,由於濱一衛與周作人、周丰一父子的親密關係,其藏書中有周作人著書多種,且多有周氏本人的署名題字,具有非常獨特的價值。有周作人署名題字的書籍包括:

《苦茶隨筆》(北新書局1935年版)

《苦竹雜記》(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6年版)

《風雨談》(北新書局1936年版)(署名周丰一)

《瓜豆集》(宇宙風社1937年版)

《清平山堂話本》(古今小品書籍印行會影印1929年版)

譬如《苦茶隨筆》一書,竟有如下有趣的題記:

“文既不佳,印刷又多錯字,可于上廁時讀之,聊以祛睡耳·漫書呈濱一衛兄 廿四年十一月十一日 作人(印章‘苦茶庵’)。”(圖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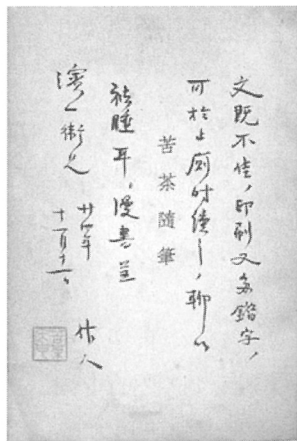


圖8 濱文庫所藏《苦茶隨筆》
(北新書局1935年版)周作人題記

五 余言

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1945年以後,周作人陷於一種極其尷尬微妙的政治處境,大概是由於這一原因,濱一衛沒有留下記述懷念周作人的文字。但據他的女兒藤本康子回憶,對於1939年回國後未能再與周作人相見,也未能報答周作人一

家的恩情，滨一卫一直深感遗憾，他常说“很想在有生之年，重访北京，拜见周先生”^⑩。

滨一卫1984年去世后，周丰一在回忆中这样写道：

在我的日本朋友当中，保持交往和友谊长达54年之久，除滨兄以外没有第二人。从1930年初次相见，直到滨兄病逝，我们或互通音讯，或相逢相见，一直保持着纯洁高尚的友情。^⑪

如上所述，因为周作人和滨一卫的交往交流以及友谊，《春水》手稿由北京东渡日本保存至今。《春水》手稿的存在和重新面世，将成为冰心研究以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珍贵资料，同时也为考察中日两国学者的相互交流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案例，而滨文库也将对中日两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尤其是戏曲研究发挥独特作用。

注释：

- ① 《濱文庫（中国戲劇関係資料）目録》，福岡：九州大学附属図書館教養部分館，1988年第2版。
- ② 另外，黄仕忠、李芳、关瑾华《新编子弟书总目》（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也著录了滨文库所藏子弟书。
- ③ 冰心：《我的文学生活》，《冰心文集》第3卷，卓如编，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8～10页。此篇最初发表于1932年10月20日《青年界》第2卷第3号。
- ④ 此处似为衍文，现保留原文。
- ⑤⑥⑦ 仲密：《自己的园地》13《论小诗》，《晨报副镌》1922年6月21日。
- ⑧ 冰心：《我是怎样写〈繁星〉和〈春水〉的》，《冰心文集》第5卷，卓如编，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27页。此篇最初发表于《诗刊》1959年4月25日第4期。
- ⑨ 饭田吉郎编《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文献目录：增补版（1908—1945）》，东京：汲古书院1991年版，收录了在日本发表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翻译文献的目录。萩野修二：《謝冰心の研究》，京都：朋友书店2009年版，第9章《日本への紹介》（对日本的介绍）。
- ⑩ 近代中国研究センター编《中国関係日本文雑誌論説記事目録》1，1964年版。
- ⑪ 萩野脩二：《謝冰心の研究》，第288页。丸山昏迷，本名丸山幸一郎（1895—1924），任《北京周报》编辑，在该刊上积极介绍鲁迅、周作人、冰心等新文学作家、作品。丸山昏迷还参加了日本社会主义同盟，与李大钊交流密切。参见石川禎浩《李大钊のマルクス主義受容》（《李大钊的马克思主义受容》），《思想》第803号，1991年5月。
- ⑫ 仲密：《关于〈爱的实现〉的翻译》，《晨报副镌》1922年8月28日。
- ⑬ 冰心：《晚祷》，仲密译，《北京周报》1923年1月14日。
- ⑭ 冰心：《我的大学生涯》，《冰心全集》第7卷，卓如编，海峡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589页。此篇最初发表于《收获》1985年第4期。
- ⑮⑯ 《1939年周作人日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第11期。
- ⑰ 滨一卫的讲义误把“问君能有多愁”中的“能”字写成“都”字，此处，笔者按原样抄录讲义。
- ⑱ 周丰一曾撰文回忆与滨一卫的交往，参见中里见敬《濱一衛の北平留学：周豊一の回想録による新事実》，《九州大学附属図書館研究開発室年報》2014/2015年。有关滨一卫留学北平的细节，参见中

- 里见敬《濱一衛の北平留学：外務省文化事業部第三種補給生としての留学の実態》，九州大学《言語文化論究》第35号，2015年。
- ⑮⑯ 鲁迅博物馆藏《周作人日记》下册，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第672、717、684页。《周作人日记》1935年2月23日部分未公开，引自周丰一《忆往》，《颶風》第18号，宇治：颶風の会，1985年，第47页。
- ⑰ 张菊香、张铁荣编《周作人年谱》，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48～452页。
- ⑱ 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档案，包括东方文化事业，已在国立公文书馆亚洲历史资料中心网页上公开（<https://www.jacar.go.jp/>）。利用该档案对滨一卫留学的研究，参见中里见敬《濱一衛の北平留学：外務省文化事業部第三種補給生としての留学の実態》。
- ⑲ 小川环树：《留学の追忆》，《小川环树著作集》第5卷，东京：筑摩书房1997年版，第430页。原文为日文，由笔者译成中文。
- ⑳㉑ 目加田诚：《北平日记》（稿本，大野城市所藏）。原文为日文，由笔者译成中文。《北平日记》现由九州大学静永健教授整理，即将出版。
- ㉒ 周丰一：《忆往》，《颶風》第18号（宇治：颶風の会，1985年），第49页。原文为日文，由笔者译成中文。
- ㉓㉔ 周丰一：《忆往二三事》，《颶風》第19号，1987年，第33、31页。原文为日文，由笔者译成中文。
- ㉕ 滨文库中保存着一部由滨一卫翻译的周作人《苦茶庵笑话选》未刊稿。1939年滨一卫拜访周府，其目的大概是直接向周作人请教翻译上的问题。1940年4月23日，周作人在致松枝茂夫的信中说道：“今日收到《中国文学》六十号，得读大文，且感且愧。又见创元社广告，知《瓜豆集》等选译本将出版，即《笑话选》亦由滨君担任翻译，更增惶恐矣。”（小川利康、止庵编《周作人致松枝茂夫手札》，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77页）但不知何故，这本《苦茶庵笑话选》的日本翻译终于没能出版。
- ㉖ 参见中里见敬《滨一卫所见1930年代中国戏剧：一个开拓表演史研究的日本学者》，《文化遗产》2014年第4期，《中国戏剧史新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中里见敬：《濱一衛1930年代留學中國考論：以其觀劇活動及原始資料考察爲中心》，《桌子的跳舞：〈清末民初赴日中國留學生與中國現代文學〉日中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下），岩佐昌璋・李怡・中里見敬編，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6年版。
- ㉗ 2010年4月藤本康子致笔者信。2009年6月，恩师村上哲见先生曾对笔者说，滨一卫任教于松山高商时，他曾去滨先生家求教汉语，看到滨一卫家里挂着周作人亲笔写给滨一卫的幅字。这可能是1939年8月周作人赠给滨一卫的《掷钵诗》。

[中里见敬 日本九州大学言语文化研究院]